

清代官书局刻书述略

孔 毅

官书局是清末同治、光绪时期各省奉旨建立的一批刻书机构，倡导者为曾国藩、曾国荃、左宗棠、李瀚章、马新贻、丁日昌等一批地方大员，他们互相关联，声援标榜，刻书种类繁，数量多，一时声势浩大，即如穷乡僻壤、村学书院，无不有之。

书局经过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和筹备立宪，刻书宗旨、管理人员诸方面都相继产生了一些变化，同时也对这些运动产生过一些不可忽视的影响。沿至光绪、宣统之际，各省纷纷建立图书馆，方将书局人员、板片、藏书裁减归并，——前后四十多年。这些书局所刻印的书籍，称为局本，其中许多校刻精审，有些史料丰富，今天仍为文史研究者、古籍整理者所常用。

对于官书局的研究，值得提出的有柳诒征先生的《官书局始末》。他曾临其境，所以对金陵、淮南、江南及江楚编译局的分合本末描述极为详细；朱士嘉先生又集诸局售书目，印成《官书局书目汇编》，为后人积累了可贵的资料；日本大西宽有《清代官书局的设置》，发表于《长泽先生古稀纪念图书学论集》，不久前《文献》杂志又发表了吴家驹《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》。

本文以文集、古志为材料，试图对这一事物进行横向的解析，其中有不当之处，敬请行家指正。

一、书局的组织管理

同治中，书局始设，督抚大员莫不视为盛事。曾国藩在军中校阅《王船山遗书》，江督马新贻、鄂督李瀚章、苏抚丁日昌等反复商讨二十四史合刻之分工，都是一时佳话。他们举贤任事，甚至亲自挂名，不但视作应圣旨之表示，也实看为风雅的机会。可惜同治中兴如过眼烟云，清末政局江河日下，书局刻书遂无暇顾及，管理机构几经归并，呈现逐渐下放的趋势。光绪时，多次裁并局所，始则如山东、山西之官书局与通志局合为一处，继则如金陵书局由两江总督划归江宁府管辖，最后如崇文书局降为管理官书处，江苏官书局之合并官书坊，以守成印售为事，边远书局当然更是名存实亡了。

与各省通志局类似，书局业务负责为总纂（或总校），事务总管为提调。正谊书局规定：总校的职责是将已校毕之书加意检点，定别字画，参订互异字句，商榷凡例，督促复校官发书收书。提调的职责则是总理支放款目，汇报请示，收书发书，（此事较繁，又从复校官中择一人帮办），监督刊刻。此二职人选多由督抚亲自从幕僚、名士中选择有学术地位而又具办事能力的人担任。如金陵书局提调洪汝奎，刻书、办差，颇得曾国藩赏识，遂竭力向马新贻推荐：“至经理此局内行而耐烦者，目下以洪琴西为最，以后视为一件官事，责成提调则书可速成，而款不虚糜之。”金陵书局初期的成功是与洪氏的努力分不开的。为了罗致名人，督抚们还常常亲自出面，千里相邀，丁宝楨督四川，延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，兼掌书局；张之洞督湖广则邀李慈铭（未去），都是明证。

下属校勘又有复校、分校二职，主要由当地候补官、无职儒生充任，崇文书局所刻《明史》，前有参校名单，计开候补州县官十二名，省、州、县各级学校的训导、教谕、学正六人，举

人、拔贡生、附生各一人，阵容相当整齐，江浙诸局当然更为强大。这些校勘有的由著名人士推荐，如浙江书局黄以周、潘鸿出为俞樾举荐，见俞氏《春在堂尺牍》，有的是从有功名的儒生中考试录取，如正谊书局诸人，见《正谊堂全书》，前附左宗棠函。

书局创始都有章程，金陵书局有章程八条，训手民四条，正谊书局有章程十二条，浙江书局也设有章程十二条，金陵书局章程出曾国藩手，山西书局章程出曾国荃手，皆深思熟虑，各有所长，规划筹措，因事制宜。如《正谊书局章程》规定：“延聘总校一人，遴派提调一人，考取分校百人，内择十人为复校，分以两班，日五人，五日更代；余分三班，日三十人，亦五日更代，轮流周始，有事先期报明某事，将次班换上，原应值者，仍按阙日补校，以免旷功”。“复校、分校值日必到局，不得顶替，日读二十页，校一千字方为中程；其有才力过人，有增无减，记勤一次；年力就衰者，分校字数多少随时酌定，不到者记惰一次。勤惰不相抵，记惰十次者出局，顶替者即日出局，均停膏火，每日提调设立课功勤惰册，以画课程”。“举贡等束身名教，当知自爱，如有饮博流荡，沾染恶习，结交非人者，出局。尤不得出入衙门，干预公事。值日之外，在家当以经史儒先诸书，时时搜诵，按日作日记一则，某日读某书若干，就中载明，月终缮清，缴局以端品学”。其余如纸张油腊，由官酌给，刻印司阁，亦有安排，各局多同，无庸赘述。

同治五年底，正谊书局成立不久，就改为正谊书院，所刻《正谊堂全书》扉页就署“正谊书院藏板”，与此类似，官办的尊经书院、存古学堂附设的书局取代了成都书局，湖南思贤讲舍附设的思贤书局，也成为省里最大的官书局，设在陕西泾阳的味经书院，在学政主持下成立刊书处，代行省局职权。——附设于书院中的书局，是书局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。

独立书局与当地书院关系也非常密切。如浙江开局伊始，即定章以紫阳、崇文二书院院长兼书局总办，当时为孙衣言与薛慰农，总、分校各员也都聘二书院师生担任，书局还曾借紫阳书院为办事处所。

立局刻书，财源是关键。一般省立书局，经费多来自厘金。厘金是清政府筹措军饷，以镇压太平天国为特征的一种捐税，名目繁多，数量甚大。至此战争略息，而抽厘仍旧，其中“余额”遂常拨作刻书、修志之用。江苏学政鲍源深在同治六年《请购刊经史疏》中说：“或疑现在经费支绌，筹饷艰难，似购书刊无暇遽及。夫勘乱则整武为先，兴学则修文宜亟，况购书刊书，经费每年不过筹饷中百之二三，筹捐尚易”。得旨允许，浙江、江西、福建诸局均用此法。

地方官僚、乡绅的捐助也是书局财政的重要来源。广雅书局创立，张之洞率先捐银一万两，吴大澂继捐三千两，地方富绅随之，共得开办费四万三千两（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）。陕西味经、山西浚文、湖北崇文均用此法。当然，也时有督抚为购书、购板、修建而拨出专款的，如张之洞曾为崇文书局拨银四千两，从赵尚辅手中购得《湖北丛书》板片即是一例。

清末国力衰竭，地方财政更不充裕，书局非要害部门，有限的款项亦常被挪用。光绪五年，山西遭灾，御史梁俊奏请“将该省书局捐款项派员分赴陕西、河南采买麦石，以备秋后散放麦种。”再加上局书的互相赠送，大量征用，书局往往收支不符，寅吃卯粮。俞樾、李慈铭、桂皓亭等学者，充任总纂，也只有二、三十两月入，时发不足救贫之叹，一般校勘收入就更为有限。正谊书局举人、贡生充任复校、分校，每月只有膏火银五两。较之咸同战时，湘军“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，统万人岁入六万金，尤廉将也”。（《湘军志》卷十八）真形同天壤。

二、局本的刊刻

(一) 底本来源

1. 翻刻殿本。同治以前，武英殿修书处已有颁发到省、允许重刊的成例，同治六年鲍源深上疏，又援此先例，提议择尤要的御纂钦定诸经史“依例重刊”，同治帝也颁“先刊列圣御纂钦定经史之书”的谕旨。这一唱一和推动了书局的设置，也造成了大量翻刻殿本中这类内容的现象。仅江苏书局就有《御注孝经》、《御纂周易折中》、《钦定书经春秋三经传说汇纂》、《御注批通鉴纲目》等十多种，这是局本中最具封建色彩的部分之一。

翻刻其余殿本。部头较大的有江西书局的《聚珍版丛书》五十四种，浙江书局的《九通》，广雅书局的《聚珍版丛书》一百四十八种，《全唐文》等。

2. 古籍善本。经理书局诸人毕竟都是读书人，他们生于乾嘉之后，深知底本的重要，于是千方百计搜集善本，翻刻流传。光绪初年，金陵书局洪汝奎曾先后委其从子子彬、次子恩嘉遍访江浙藏书家，“遇有经史善本及海内稀有之书，足以辅翼经传，嘉惠后学者，即就近妥觅书手钞缮副本，悉心校对，携带回局，以便随时酌定，分别刊传。”俞樾任职浙局，为讨论校刊底本，也不烦书信往复，如称《内经》马元台注本，于古义未通，当以王冰注、宋林亿、孙奇、高保衡校正者为最善，确为经验之谈。浙局重视底本选择，刻出了一批好书。

3. 清人稿本和流传不多的刊本。这是局本中数量较多，价值较高的部分。浙局《二十二子》就大多采用了清人的新校本；如《孔子集语》为孙星衍辑本，其自刊《平津馆丛书》已收入。俞樾认为，他将“古书中所载孔子之言无句不搜，一一注明出处”，视薛氏（宋薛据）之书奚啻倍蓰，允宜刊刻，以广其传。

（《春在堂尺牘》卷五）此外如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孙子十家注》也是孙氏校本，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墨子》用毕沅校本，都是今胜于古。先师吕贞白先生曾说：“浙局刻《二十二子》，选用底本、翻刻，均极精审，翻刻时校对亦谨严，原刻本不易得，得此翻刻本，亦可依据”。对其传播之功评价甚高。崇文书局刻《正觉楼丛书》，广雅书局刻《广雅丛书》，则收入了很多稿本，也有很高的价值。

4. 江南局本。山西、云贵等偏远书局，虽然亦以征集善本相号召，而力多未逮，遂多以江南局本为底本进行翻刻。

5. 利用官刊旧板，收买私人板片。乾嘉时各地官府刻书较为普遍，所存板片自然为书局所用。江西书局创立，“查藩司署内本藏有御纂钦定各经等项书板，历年久远，残缺不全，难以刷印。”遂“先将藩署旧存书板，逐加整看，分别修补”（《刘忠诚公遗书·奏疏》卷七）。

收买私人板片。江苏书局相继觅得《通鉴》、《续通鉴》、《明通鉴》诸板，珠联璧合，并以此为基础，刊成《资治通鉴汇刻》八种。

（二）校勘整理

江南诸局都聘著名学者为总校，网罗各方专家以充校勘。校勘时也大多有固定的分工和适当的程序。《正谊书局章程》规定：总校一人主要是制定体例，解决疑难；复校、分校各执其事。程序为：分校者按卷先读一遍，校一过，将副本及别刊本再校一过，破蛀者补缀完善，讹错者随笔粘条，书中引用语偶错，或原文字与别刊本互异，亦标记之，破体俗字，签明改正；再送复校一审，汇缴总校二审，然后发缮，缮毕如前遽校付刊，刊后刷出校样，如前遽校付修，校出异文别以色笔标于本书之上，盖校勘者名印，以示谨慎。

篇幅较巨之书，更为慎重。为了确定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分

工，统一其体例、版式，曾国藩、马新贻、李瀚章、丁日昌以及俞樾、李慈铭等人信函往复，互相辩议。俞樾甚至在任教的诂经精舍以汇刻全史章程命题，肄业生潘鸿拟八条进，备受俞樾赏识。其中有：殿版、汲古阁版、南北监版等应作校记附末；应备《两汉刊误补遗》、《三国志考证》等书参考；《天文》、《律历》诸志应请专家校勘等，都很有眼光。

《二十四史》中，后人评价较高的多出金陵书局，其中《汉书》由刘毓崧亲纂凡例，列对校、本校、他校诸书，网罗前人成果，分校各责专成，（刘毓崧《通义堂文集》卷五）可称无懈可击，体现了该局的水平。

当然，并非各局都有这样的条件，由于经费、学力等方面的原因，崇文书局的虽校而未善，江西、山西的无力详校，正谊书局的刻书甚少，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。再加上局本年代稍近，得之容易，所以多不为今人所重。

（三）刻印

清代兴盛的地方刻书业为书局准备了充足的技术人才。浙江书局刻工常达一百多名，（洪焕春《浙江文献丛考》）崇文书局盛时更有数百手民缮刻印刷，二局刻成的板片都在十万片上下。

曾国藩定有训手民四条，刻字又有“方粗清匀”四项要求。他“请局中诸友，常常执此四端，与工匠讲求，殷勤训奖，严切董戒，甚至朴责、议罚俱不可少，自然渐有长进，或者写手略分甲乙，上下其食”。他还建议：“工匠之殿最赏罚，亦可酌议条规，即度板、开刷等事均立章程，以便遵守”。

正谊书局的工人，“总有限状，日刻一万字，不得迟延”。

除自刻以外，有些书局似还将校本发往书坊刊刻。卢前《书林别话》说：“近百年刻书业则始于洪杨事变（按即太平天国起义）之后，随曾、左而起者曰李光明，江南官书局所刻皆出李氏，

其后则有姜氏。”李光明庄在南京秦状元巷，所刻书存世很多，诸经刊本前各有牌记，述其设肆、校勘诸事。未见为江南代刻事，姑录以待考。

局本注重普及、价廉，对纸张、装潢不甚重视，只有进呈御览、上交国子监等数种间作特别加工，这些本子存世太少，不易见到。

三、局本的发行

同光之际，书局四起，印本极多，遍及城乡，其发行渠道略有以下数端：

（一）颁发、咨取。清代前期殿本已有赏赐、颁发、出售诸例，官书局仿之。每书刻成，上缴翰林院、国子监二处，光绪二十年又增曲阜衍圣公府一处。由于先前衍圣公府失火，旧藏书籍图录焚毁一空，王懿荣就上疏要求各省官书局“除以初印精槧一份解送翰林院敬备皇上取进御览，一份解交国子监充备肄业生传习外，可否□□飭下各直省督抚有书局者，无论新旧诸刻本，亦以一份解交山东巡抚，转行曲阜作为恩施衍圣公孔令貽敬谨储藏，以为诵法之资，遇有新刻陆续咨解。”得到光绪的同意。这些上缴本的纸张、装潢都比较讲究，刘坤一在寄左宗棠函中谈到：“金陵、苏门、维扬、章□各局官书，业经檄飭，务选上色纸张，订送敝署，以便汇交转运局，解赴国子监验收。另二处当亦相同。

清雍乾年间，朝廷常将武英殿所刊书籍颁至各省大书院，亦准督抚购买十三经、廿四史等书颁发各学。仿此，局本也很快成为本省各级学校的基本藏书。最著名的是南京的劝学官书局，这是同治十年江南盐巡道孙衣言“请于总督曾文正公取江宁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北四书局新刊经籍，每部四分，藏于惜阴书院，凡本籍士子得诣书院借读，事领于官而簿钥、出纳则绅士掌之”。这

个设于学校，面对当地的“书局”，已开了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先河。

边远省市创立书局常咨取作为刻书样本、校勘底本，无力多刻则又报请朝廷转发局书，陶模光绪二十三年《奏为甘肃书籍缺乏，拟恳圣恩准臣咨取各处局官书，免其缴值以惠士林恭折》要求调书备览，可证。（《陶勤肃公遗稿》卷七）光绪二十八年十月，京师大学堂设立藏书楼，由管学大臣咨行各省官书局，调取各种经史子集及时务新书，书款由各书局项下报销。（《北京大学校史》）以后各省成立图书馆，也多咨取局本全份充藏。

（二）交换。各书局间，书局与朝廷诸部之有印书者，各以书籍相交换，书局的藏书楼遂得以逐渐充实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外交部也试行此法。

（三）赠送。朝廷、地方大吏向书局主事索书者颇多，俞樾就曾致函李瀚章，索取鄂局所刊《国语》、《经典释文》等书。光绪元年，金陵书局提调洪汝奎捐购局书，储于敬敷书院之类，则是赠书的特例。

就书局内部而言，凡参与校勘的按例可得印书一部。向书局提供善本者，翻刻以后，也可以得到初印数部。这些规定和现代出版社已相差无几。

（四）销售。各局都在省城设店售书，为了扩大销量，很多书都用不同纸张，如连史、赛连、毛边印刷；又按装订、不装订，十二裁、八裁、六裁，规定出不同的价格，以应付各种不同的需要。他们还印有书目，廉价出售，或者随书附寄。

各局间也互相沟通，并和各地主要书店、学堂挂钩，互相代办业务。这以设在济南城内后宰门的山东书局最为突出，从售书目录可见，其门售书籍达一千多种，同种书籍又有不同版本可供选择，如诸经合刻本就有广东书局仿武英殿本，江西、湖南、苏州的阮元校勘本，山东、江南和李光明庄的《十一经》、《十三

经读本》，湖北、浙江的《御纂七经》，还有未署局名的《相台五经》、《十三经古注》。丛书部分则罗列了从《汉魏丛书》到江杏溪《聚珍丛书》，共近百种，几乎囊括了晚清的大部分名刻。精刻名钞部分还列出了明南监本、汲古阁本、武英殿聚珍本等三百多种，真是琳琅满目。

书局利用省城设肆的优势，还为私人代销书籍，书名也一并刻入书目，江苏、浙江、江西等省书局均如此。

四、局本的内容

清末的中国，儒家学术仍占主导地位，但随着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，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。这种复杂的背景导致在官书局以外，又逐渐出现各种译书局，专事翻译书的出版；反映敏锐的民营书局，编印应时新书，生意日益兴隆；官书局刻书内容也不断有所变化。

试依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简析局本内容如下：经史是局刻的重点，仅《御纂七经》就有浙江、江西、崇文、江南四种刻本，各种本义、要义、读本、注疏，更是名目繁多。较之殿本，局本增加了许多乾嘉学者校经、解经的著作，学术性较强。《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》是以宋本为底本精心校勘而成的较好的本子，嘉庆时阮元任江西巡抚时所刊，板藏南昌学堂，江西书局成立，取原板修补刷印，广东书局、湖南书局也仿阮本刊印，江苏书局则抽注疏单刻，影响很大，且至今没有能取代它的新校本。又如湖南善化皮锡瑞是近代经学大师，历主龙潭、经训等书院，所著《经学通论》、《经学历史》等书，思贤书局陆续刊刻，后编成《皮氏经学丛书》（或称《皮氏八种》）。

史部照例刻印了《御批通鉴纲目》等御纂钦定之书外，较有价值的是五局合刻的二十四史，江苏书局的《资治通鉴汇刻》、《历朝会要》，江西、广雅书局的历朝纪事本末，浙江书局的

《九通》等。

在设立书局的同时，各省还开始编纂地方志，有些通志局在光绪初，因裁减局所，而与书局合并，他们编出的志书当然也由书局刊刻。书局利用引进的石印术印刻了大量地图，如江西书局印的《东三省铁路图》、《悉别利铁路图》等多种。此外吏治之书数量也颇不少，流传较广的有丁日昌辑集的《牧令全书》八种、崇文书局的《牧令书四种》、浙江书局所刊张廷骥辑集的《幕须知五种》。各省鉴于涉外事务的增多，命书局刊刻了一些法律、条约的汇编。江西书局就曾刊印了《辛丑各国和约》、《各国通商行船条约》、《约章成案汇览》、《乙巳交涉要览》、《大中小学堂章程》等（《江西书局价目》）。

子部中遍刻诸子的有浙江书局的《二十二子》、崇文书局的《百子全书》，前者精校精刻，质量甚高，后者勘刻均逊，虽收罗较广，但不为人所重。其余以儒家著作、笔记小说和医籍为多。徐大椿是清代名医，各科俱通，亦精本草，江西书局光绪九年刊成的《粹园医书六种》，崇文书局同治十二年的《徐氏医书六种》都收辑了他的著作。

集部书籍数量略少，而重点在《文选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正续古文辞类纂》之类总集和清人文集，以乾嘉以来学者文集为主，也包括一些局人师友的文稿，如曾国藩同治十一年去世，传忠书局二年中就刊印了他的诗集四卷，文集四卷（均编年本）和诸种诗钞、杂钞、《经史百家简编》等；光绪以后，又陆续整理出诗集、文集的分体本、日记、批牍、杂著、书信，集成较完善的《曾文正公全集》，现在看来，这些著作都很有价值。

书局后期还编印了各种类型的教科书，如初等小学图书教科书等，内容固然比较浅显，但已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兴趣，其中以江楚等译书局编集的为多。

局本从内容上看有以下特点：

(一) 刻书前后期重点不同。各局始建，为适应书院教育和科举的需要，多刻御纂钦定经史、五经四书各种读本。力量充实后，转刻大部头经史，有份量的丛书。后期受新学影响，还编译了一些自然科学书籍和教科书。

(二) 继承殿本，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。同光二帝对书局的选书、刊刻曾作过一系列指示，表明对钦定经史、《五经四书》的重视，还专门推荐吕坤《实政录》、朱子《小学》等书，命书局刊行，（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卷101）主持者地方大吏、封建宿儒对此当然无不踊跃。刊书同时，他们又对书坊刊刻“有违风化”的小说、戏剧和《警世钟》、《猛回头》等“逆书”严加查禁，视同洪水猛兽。

(三) 相比殿本，具有较高的学术性。这集中表现在大量刊刻清人著作上。张之洞是书局的重要人物，他认为：“大抵征实之学，今胜于古，即前代经史子集，苟其书流传自古，确有实用者，国朝必为表章疏释，精校精刊，凡诸先正未言及者，百年来无校刊精本者，皆其书有可议者也”。中肯地评价了乾嘉以后的版刻，也充分揭示了书局诸人的出版思想。

(四) 各具地方特色。以中小书局为最明显，不仅方志、地图，而且学术著作、文集也都如此。如《王船山遗书》、《曾文公全集》、《皮氏八种》以及《庄子集释》、《庄子集解》、《释名疏证补》、《墨子笺》等书都是湖南官书局所刊的湘人著作；山西书局印书不及百种，除《山西通志》外，也印行了《山右金石记》、《山右石刻丛编》、《山西沿革图》、《晋阳明备录》等本省文献。

五、局本的版刻特点

官书局分布甚广，情况复杂，因此其版式、装潢、字体都不如殿版整齐；财力、人力不能尽如人意，因此对形式、外观不如

殿版讲究。约略言之，可成系统者有以下数端。

(一) 局本以横细竖粗的扁体字为主，最典型的是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和金陵书局所刻书，都是行字稍密，字体略扁而横细直粗，用墨较黑，后人多嗤之不美观。岂知，这在当年却是有意为之。曾国藩最喜欢结体方正，笔画粗重的印本，他认为：“近日刻板精雅者，宋体字如阮太傅《揅经室集》，仿汲古阁《乐府解题》、《六十种曲》等样子，画精线粗，最为耐久；元体如黄尧圃、秦恩复、胡果泉影宋诸刻亦贵，字画粗重，而增之以锋棱”。因此对金陵书局同治中所刻前、后《汉书》也提出方、粗、清、匀四项要求，方以结体方整言，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棱角，是不仅在体，而并在画中见之；粗则耐于多刷，最忌一横之中太小，一撇之尾太尖等弊；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，字边不与直线拂；匀者字之大小匀，布白之疏密匀”。可见他完全是从美观和耐用的角度来选择字体的。他还建议书局“将宋体字书刻之精者，如汲古阁《乐府诗集》、《揅经室集》之类，须觅一二初印存于局中以作榜样，吾辈留心物室可也”。

前、后汉书在五局二十四史中刊刻最早，用汲古阁体，以后各史都仿此为之。俞樾主持浙局，曾函致两江总督马新贻：“尊意全史格式，宜求一律，请将金陵新刻前、后汉书样本寄一、二本来，俾各局知所法守，幸甚。”又函云：“顷杨石泉方伯（指杨昌濬）交到前、后汉书各一部，……其字体工整，格式大方，洵为海内善本，即函告浙局诸人，新旧唐书照此刊刻，使成一律，亦艺苑之巨观也。”（俞樾《春在堂尺牍》卷二、三）

金陵书局史书得到诸局的认可，奉为圭臬，王闿运致邓某函云：“局刻辽、金、宋三史均仿南北史款式”（王闿运《湘绮楼笈启》卷四）南、北史正金陵书局所刻。光绪初，《二十四史》全部竣工，更扩大了影响，经史子集照以写板，诸局多同。

(二) 局本中仿殿版字体、版式的也为数不少。前述各局初

创都以翻刻殿本御纂钦定之书为急务是其原因。淮南书局拟刻大字本《十三经注疏》，曾国藩主张“仿殿本写刻，如有剪裁订正之处，则别为校勘记，附于每卷之末”。殿本字体典雅，书写工致，为书局仿刻所不及，但笔划板滞、缺乏生动则同。有些书局因欲减少成本，特将版式缩小，行数增加，进行翻刻，这种翻本虽然保存了字句，但显然已失去了原来的风格。

（三）各局沿袭其历史传统，而表现出地方特色。金陵书局板框宽大，字体稍扁，在局本中最有代表性；浙江、江苏、淮南都用通行的方体字，板框略小，属于秀丽的一派，是局本中的上乘；江西、山西的一些刻本，版式如金陵而字体更为宽扁，纸墨较为低劣，不为人所重；崇文书局《明史》横细直粗，刷墨甚黑，与金陵局本一般无二，而《明通鉴》等书却是端丽的仿宋字，与之大相径庭；思贤书局所印字方而墨黑，与湘中其余书同。贵州书局光绪中成立，巡抚嵩崐奏称：“请仿江南等省书局，刷寄所刊经、史、子、集，每种十部，以作式样。”得旨允准。这些边远书局的刻本往往可以在江南局本中找到版式的来源。

（四）活字、石印、套色。较早使用活字的有金陵、崇文等局。同治六年两江总督李鸿章在金陵设聚珍书局，这是一个专营活字印刷的书局，以道员一人掌之，排印了《硃批谕旨》、《两汉刊误补遗》、《三国志》等书，光绪五年裁撤并入金陵书局。

活字起用虽早而进展缓慢，石印很快就盛极一时，从《江西书局价目》看来，宣统时石印书已经占了很大比例，不但用以印刷厚薄不等的书籍、章程，而且广泛用来印刷各种地图，《省城街道图》印了大小二种规格，《中外舆地全图》每部英洋二元。书局已经成功地在地图上使用了套色技术，《绫表设色统省全图》，也售到每套钱三千六百文，这在我国地图印刷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。

光绪时，江苏书局印售了影刻的《古佚丛书》比乾嘉时的仿宋刻本更为逼真，但这书的板子却是黎昌庶出使东瀛访求古本，用日人所刻，后板送江苏书局，故需当别论。

最后顺便提一下局本的纸张。为了降低成本，诸局多用连史、赛连、毛边、毛太等名种。同时他们还常用一种官堆纸，更为粗糙、厚重，却比较坚硬，山西书局成立时，巡抚曾国荃曾托闽浙总督何璟到上海购买，并香墨等物，由轮船运至天津，转解去晋。云贵两省多用皮纸，而广雅书局则用南扣纸、本槽纸，这些都是当地所产，因此与其余局本不同。

道光以后，中国社会进入动荡阶段，频繁的战争使“公私藏书荡然无存，未刻的著述稿本，散亡的更不少。”（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）同治中期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“复苏”，各地官书局的建立，就是在文化领域的一个振作，它们利用官府的力量，聚集了许多学者、刻工，大量整理刻印书籍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，并有力地促进了科举和书院的恢复。光绪后期，更为各地图书馆的建立提供了藏书和基地，作出很大的贡献。

官书局刻书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东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系